

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策略与亲子关系研究

■ 杨 梨 王曦影

(重庆科技大学 法政与经贸学院,重庆 401331;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基于隐私沟通管理理论视角,本文选取28位Z世代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发现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策略包括“控制—服从”亲子关系下的顺从策略、“控制—抗争”亲子关系下的妥协策略和“亲密—信任”亲子关系下的自主策略。建议Z世代青少年的父母根据其所处的生命周期及时调整隐私管理边界,并支持子女自主选择隐私管理的方式,帮助Z世代青少年自主发展。

【关键词】Z世代 隐私管理 亲子关系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04

一、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儿童和青少年隐私保护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成年人对儿童和青少年有目的的和经常出于善意的监管被称为亲密监管(Intimate Surveillance)^[1]。在父母和教师进行的教养、教育过程中,儿童的隐私也受到成年人亲密监管行为的威胁^[2-3]。在上述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的隐私与亲密监管之间的张力是每个家庭面临的棘手问题,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

伴随互联网的发展成长起来的Z世代(Generation Z)青少年^①的家庭隐私管理与亲密监管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杨 梨,重庆科技大学法政与经贸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儿童福利、教育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学;
王曦影(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与青年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2023年度一般课题“习近平家教重要论述指导下困境儿童家庭教育研究”(课题编号:K23YG2150234)、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研究”(课题编号:21SKGH257)、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困境儿童的分层化管理与精准化帮扶对策研究”(课题编号:2022YC04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Z世代通常指1995-2009年出生的群体,本文的研究对象出生于2001-2005年,接受访谈时,他们的年龄在14-18岁之间,故在文中称之为Z世代青少年。

可能出现新的变化。学界对Z世代的具体出生年份的界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比较常用的Z世代概念描述是指那些出生于1995-2009年,伴随着互联网技术成长的一代人,数字原住民是其最显著的标志^[4]。随着数字技术对人们的高度解析,每个人成为分散的、具有高度差异性的个体^[5]。青少年处于自主性发展的关键时期,通常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6]。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单方面掌握孩子隐私信息常常被看作是合法的、合理的事情^[7]。当今社会,许多父母处于焦虑状态,他们担心孩子的安全和幸福,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带有跟踪功能的电子设备)被用来缓解父母的焦虑,但这也把孩子置于更加频繁的亲密监管之下^[8]。这种过度保护的亲密监管将增加青少年对成人的依赖性,阻碍青少年发展抗逆力、自主性等能力^[9]。因此,父母需要在监管孩子、确保孩子安全和信任支持孩子自主权之间找到平衡^[10]。在上述背景下,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家庭关系与自我成长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尽管有关儿童、青少年隐私保护的研究日益丰富,但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及亲子关系这一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应有的重视。本研究采用沟通隐私管理理论,探讨Z世代青少年在家庭内的隐私管理策略、亲子关系与其自主性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而言,Z世代青少年在家庭中使用何种隐私管理策略?亲子关系在Z世代青少年维护家庭隐私中有着怎样的作用?Z世代青少年的父母及其他教育者应当如何看待和处理亲密监管与家庭隐私管理?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一)隐私沟通管理理论与家庭隐私管理

隐私沟通管理理论(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为研究隐私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将“隐私”界定为对个体有深刻影响的私人信息。人们对个体的隐私信息拥有所有权,他们建立界限,确定个体信息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公开或保密的程度,并制定规则以针对不同受众决策信息披露程度,这便是隐私管理行为^[11]。隐私沟通管理理论关注家庭隐私管理的开展。家庭成员经常面临管理隐私信息的具体选择^[12],总是在“自我披露”与“隐私边界”之间徘徊,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分享隐私与其他家庭成员保持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保留自主空间^[13]。隐私管理是各方互动和协商隐私边界的过程。不过,隐私边界管理过程可能会失败。如果隐私相关的各方无法确定有效的隐私管理规则,就会出现隐私边界混乱的问题^[14]。

隐私沟通管理理论探讨了影响和塑造隐私管理行为的因素,其中文化和性别是核心的影响因素。不同文化群体对隐私的理解和管理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同一隐私问题的看法有所不同^[15]。男性和女性可能会根据他们的性别差异制定不同的隐私边界规则。除此之外,动机、背景和风险收益比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动机因素指人们透露或隐瞒信息的内在原因。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等背景条件也会影响人们的信息披露决策。人们对信息披露风险和收益的心理计算也可能会影响个人选择信息披露。人们倾向于选择最适合于情境需求的隐

私边界规则^[16]。

隐私沟通管理理论有助于解释青少年为何采取不同的家庭隐私管理策略。子女在与父母的互动和协商中不断确立和改变隐私规则,因而家庭的隐私管理复杂多变^[17]。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自主发展的需要增强,他们经常为了增加自主权和保持独特的身份而建立隐私界限^[18]。尽管专制的教养方式受到广泛批评,但是有些父母不愿意放弃控制,亲子之间“要放弃多少”和“自我暴露多少”的磨合过程也是家庭隐私边界的协商过程^[19]。

隐私沟通管理理论关注隐私边界与自我披露的协商过程,也关注影响隐私沟通的主要因素,可以用于解释家庭内部信息披露与隐私管理策略的复杂性^[20]。因而,隐私沟通管理理论适合用于分析Z世代青少年如何选择家庭隐私管理策略。

(二)青少年的家庭隐私管理与亲子关系

已有研究发现,亲子双方家庭隐私管理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一项针对上海141名初中生、197名高中生和256名家长的调查研究显示,相比于初中生,高中生更看重自己的隐私,父母更看重亲密监管而很少尊重孩子的隐私权^[21]。一项有关儿童权利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家长可以看寄给他们的信”这一说法,62.7%的儿童表示不同意,但仅有7.3%的家长表示不同意;对于“为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家长有权检查孩子的日记”这一说法,高达82.37%的儿童表示不同意,而表示不同意的成人仅占3.89%^[22]。上述研究表明,亲子双方的隐私观念和行为的差异是诱发家庭隐私管理冲突的重要原因。

已有研究发现,新时代背景下Z世代青少年的家庭隐私权管理面临诸多难题。在教育内卷、强调安全的家庭文化背景下,家长精心安排儿童的课外时间,儿童的生活呈现高组织化、高结构化的特点,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儿童保有秘密和隐私的空间和时间^[23]。研究发现,青少年及其父母的隐私观念缺乏、家庭隐私边界模糊、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基层立法不完善和社会配套措施缺失共同导致了未成年人家庭隐私保护困境^[24]。

不少研究还关注手机使用及社交媒体传播背景下家庭隐私管理出现的新趋势。有的父母会查看孩子的手机通信记录、短信、QQ空间等,还会通过GPS定位功能掌握子女的行踪,子女则采取删除短信、设置密码、匿名通讯录等方式保护自己的隐私,进而形成亲子之间围绕手机的控制与协商隐私的动态过程^[25]。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由于集体主义文化(如,父母一代)和个体主义文化(如,子女一代)之间的冲突,亲子之间很容易发生隐私管理的冲突^[26]。当然,亲子双方在数字媒介沟通互动中也会不断调整和重塑家庭隐私边界,进而亲子双方对家庭隐私产生了新的认识和定义^[27]。

上述研究为分析家庭隐私管理中亲子双方的分歧提供了重要基础。亲子双方的隐私管理观念和策略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而亲子关系不和谐往往是争夺隐私控制权的结果。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青少年家庭隐私管理策略的形成过程,也较少深入阐述隐私管理、亲子关系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本研究采用隐私沟通管理理论视角,分析Z世代青少年如何造就不同的家庭隐私管理策略,并尝试解释隐私管理、亲子关系与Z世代青少年自我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本研究将家庭成员对隐私管理策略的选择看作一种动态的交流状态,而不是一种稳定不变的状态。本文不仅要分析家庭隐私管理的代际差异,还要呈现同

一家庭中亲子关系和互动如何影响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及其自主性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为了更全面地收集资料,本研究基于方便抽样原则,于2019年在江苏省S市5所中学(包括2所高中和3所初中)开展访谈。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考虑不同年级、性别的学生,经过学校初一、初二和高一、高二年级各班班主任推荐,在每所学校访谈了30名学生。根据研究的需要,访谈对象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出生于2001-2005年,接受访谈时他们的年龄在14-18岁之间,属于Z世代青少年;二是在家庭中拥有独立房间;三是围绕家庭隐私话题有着比较丰富的经历。最终,本文从访谈资料库(共190位访谈对象)中选取了符合以上条件的28位访谈对象,其中,男生和女生各14人,13-15岁12人,16-18岁16人,初中生11人,高中生17人。在受访者中,有10人为独生子女,其余18人成长于多子女家庭;有11人家中同住人口只有2-3人,其余17人家中同住人口有4-6人;有6人曾经有过留守儿童经历。

按照学校、访谈工作人员及访谈对象性别对访谈对象进行编号,P1-P5分别代表5所学校,N1-N14分别是14位访谈工作人员的代号,根据在每所学校各个访谈员访谈的顺序对访谈对象编码D01-D05,F代表女生,M代表男生。如,编号P2N5D01F代表在P2中学,访谈员N5的第一位访谈对象,且是一位女生。

每位访谈对象的访谈时间为1-2小时。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研究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之后将访谈录音逐字逐句转录为文本。研究者对资料进行初始编码,运用了“持续比较的方法”分析资料^[28],辨别和澄清访谈对象对家庭隐私、亲子关系等议题的理解和行为方面的异同。然后,研究采用类属分析和情境分析方法进一步概括和归纳资料^[29],将访谈对象的家庭隐私管理行为分为三类,并呈现他们家庭隐私管理的策略及其与家庭亲子关系之间的联系。

四、研究发现

根据房门的开关、是否需要敲门等家庭隐私管理策略的差异,在家庭中拥有自己独立房间的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管理策略大致分为三类:顺从的隐私管理、妥协的隐私管理和自主的隐私管理。

(一)顺从的隐私管理与“控制—服从”的亲子关系

一些被访Z世代青少年的房间通常是不关门的,因为父母不让他们关门,他们就顺从了父母的想法,本研究将这些Z世代青少年称为顺从的孩子。比如,一位高一女生(16岁,成绩中等,独生子女)表示:“我对开门、关门都无所谓”(访谈编码:P1N9D04F)。另一位高一男生(16岁,成绩比较靠后,非独生子女)也表示:“我的房门钥匙基本上都在上面,就不需要关门了。”(访谈编码:P1N11D02M)

上述Z世代青少年不觉得父母进他们房间或者约束他们使用手机是父母侵犯了他们的

隐私。事实上,他们认为父母完全可以随时进入他们的房间和约束他们的行为,他们接受父母随时监管他们的学习或游戏行为。“爸妈不让我碰手机,放假也不给,刷手机确实耽误学习,我现在成绩已经很差了”(访谈编码:P1N11D02M)。这些青少年选择做顺从的孩子,他们理解父母希望孩子披露更多的隐私,他们通过自我披露来满足父母的愿望^[30]。

根据隐私沟通管理理论,顺从的孩子没有将自己的房门关闭则可被视为他们放弃了对个人隐私信息的控制,他们将父母视为有义务共享隐私信息的人^[31]。他们没有试图关上房门或要求父母敲门,而且还声称父母的隐私管理是为了让他们更专注于学习。他们学习顺从父母的想法,按照父母的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从而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一位初二女生表示:“我不关门,因为我妈不让,关门她就会说我。”(访谈编码:P4N11D03F)

然而,顺从的孩子往往并没有与父母讨论过有关家庭隐私和亲密监管的话题。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习得了通过察言观色猜测父母对他们隐私方面的要求,并且尽量按照父母更喜欢的方式来决定隐私管理策略。一位高一女生表示,“有一次,我带了一位同学回家,我感觉妈妈不太高兴,说话语气不太好。她可能不太喜欢我这样,以后我就不带同学或朋友回家了”(访谈编码:P1N11D03F)。这说明这些孩子在隐私管理策略上的顺从态度——他们知道或猜测父母希望他们如何做,于是他们愿意忽略自己的感受,以父母的要求为标准来确定隐私管理行为。

顺从的孩子通常是被动顺从,由于父母一贯的管教方式比较严格,尤其是对他们的学习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和期待,只要是妨碍学习的事情,就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位被访者(16岁,成绩中等,独生子女)表示:“我都见不到手机,成绩要保持稳定,就不能下降”(访谈编码:P1N9D04F)。另一位被访者(16岁,成绩比较靠后,非独生子女)也表示:“爸妈不让我碰手机,就是放假也不让碰手机。”(访谈编码:P1N11D02M)

这些Z世代青少年完全顺从父母意愿确定自我隐私边界,但这并非出于被访者的本意,而是Z世代青少年受制于父母的控制,不得不服从父母的各种亲密监管要求,放弃在家庭中的隐私管理空间与权利。在这类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一切事物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孩子的隐私和秘密在由父母掌控的家庭空间中难有容身之处^[32]。亲子双方都认为家长对隐私边界具有控制权,一些Z世代青少年也表示自己的隐私观念与父母是一致的,并强调父母观念的重要性,对于这些家庭而言,隐私边界是一种施加控制的方法^[33]。顺从的孩子认为,父母不允许他们拥有隐私或秘密,父母可以翻阅孩子的日记本、手机,甚至没收手机、封存电脑,让孩子难以保有自己的隐私。

“控制—服从”亲子关系下Z世代青少年顺从的隐私管理不利于青少年的自我发展。已有研究表明,掌握孩子更多的隐私或经常采取隐私侵犯行为的父母,更容易认为孩子的服从性很高^[34]。然而,顺从的孩子缺乏对自己生活空间和秘密的掌控权,这实际上是父母对他们内心世界的入侵,让孩子随时要保持自我披露,也就难以探索自我与他人的边界,从而影响他们自我探索,难以处理未来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

(二)妥协的隐私管理与“控制—抗争”的亲子关系

有的被访Z世代青少年在态度上表现出对父母亲密监管的排斥,但在具体隐私管理策略上

却不得不妥协,接受父母不准关门等隐私管理要求。这些Z世代青少年的父母要求孩子开着房门,还在孩子不知情或经过孩子允许情况下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等私人物品。一位高一男生(17岁,成绩相对落后,独生子女)表示:“以前初中,妈妈就会翻我东西,我有什么事儿,她都知道。”(访谈编码:P1N8D02M)

妥协的孩子有明显的隐私诉求,他们也曾经采取一些办法来捍卫自己的隐私界限。一位高一女生(16岁,成绩中偏下,非独生子女)表示:“以前我经常锁着门,后来我爸跟我吵了很多次,有一次我摔门把门锁弄坏了,没办法锁门了”(访谈编码:P1N10D03F)。这些Z世代青少年原来在自己的房间会关门,父母敲门再开门,但是亲子之间常常为此而争吵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关门。

一些Z世代青少年表面上向父母妥协,不再要求父母尊重他们的隐私,但实际上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一位高一女生(16岁,成绩中偏下,非独生子女)讲述了她如何保护自己的手机隐私:“我妈妈要求把她的指纹录进我的手机里,我当时让她录;然后就把她(指纹)删了。我感觉这是自己的隐私,被她翻看隐私心里不舒服。”(访谈编码:P1N8D05F)

事实上,Z世代青少年表现出对隐私权利和父母隐私控制的复杂解读。一方面,他们觉得父母没有控制孩子隐私、要求孩子自我披露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同意孩子仍然需要服从父母的观点——父母可以决定送他们去何种类型的学校,并有权管理他们的学习或者电子产品的使用。一位被访者表示:“爸妈发现我玩手机的劲头太大了,拿到手机基本上不离手……所以他们不放心,让我开着门也是担心我管不住自己”(访谈编码:P1N12D02M)。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父母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父母对Z世代青少年生活的某些部分有权利,但不是完全控制。这表明这些Z世代青少年强烈需要与父母协商隐私共同所有权的具体边界^[35]。但是,这些孩子也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子女,要与父母协商隐私边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开始隐藏自己的想法,并采取一些隐秘的行为,以便无需父母的许可就能竖起厚厚的隐私墙^[36]。

与“控制—服从”亲子关系下形成顺从父母、披露隐私的Z世代青少年类似,妥协的子女通常也面临着父母控制型的教养方式,他们的房间都不能关门。与之不同的是,“控制—抗争”亲子关系下的被访Z世代青少年顺从父母披露隐私的意愿更低,并且他们还常常以一种比较隐蔽抗争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隐私。一些Z世代青少年向父母表达希望他们进自己房间的时候能够敲门,但父母并不会听取他们的想法。他们发现,父母并不认同子女在家里应该保有隐私或秘密,亲子之间难以达成一致的隐私规则。一位高一女生表示:“我让他们敲门,可是,他们都是直接推门进来,我说过很多次了,他们还是不遵守。”(访谈编码:P1N10D03F)

在这些被访者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感受到与父母的隐私观念存在冲突,这阻碍了他们向父母自我披露,于是他们采取抗争策略建立起自我隐私边界。有研究发现,虽然母亲并不认为女儿对她有过任何秘密,但女儿却表示,有些事情母亲“永远不知道”,是她自己的秘密^[37]。一项针对美国336对父母与孩子(9-15岁)的问卷调查发现,由于亲子双方处于不同的生命历程阶段,父母倾向于更强烈地控制或投入亲子关系中,而子女则更希望创造一种独立于父母和

家庭的自我身份^[38]。

还有被访Z世代青少年表示,因为父母习惯采取“打骂”教育,让他们在权衡风险收益比时更可能采取隐蔽的方式抗争,而不是直接反抗。他们知道,如果直接反抗,不仅依然无法保护隐私,还可能引发更坏的结果。在上述这些妥协的子女看来,隐蔽的抗争以不让父母察觉的方式,争取到了隐蔽的隐私空间,他们对信息披露风险和收益的心理计算影响了他们的隐私管理策略选择。

(三)自主的隐私管理与“亲密—信任”的亲子关系

在访谈对象中,也有少数Z世代青少年具有比较强的自主性,他们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房间是否关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对自己房间是否关门可能有着不同的做法。有被访者(17岁,成绩靠前,独生子女)表示:“房间门不锁,他们进我的房间也不用敲门”(访谈编码:P2N1D01M)。也有被访者(16岁,成绩中偏下,独生子女)表示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效仿我表姐,她喜欢关门,我也把门关上,但多数时间我是不关门的。”(访谈编码:P1N9D02M)

对于完全不锁门的Z世代青少年而言,他们相信父母,愿意更多地自我表现。“我跟爸妈关系很好,他们从来不会打骂我,有一次老师批评我,还打电话跟我妈告状,但其实是老师误会我了,我妈妈没有因为老师告状而批评我。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隐私要瞒着他们”(访谈编码:P2N1D01M)。有被访者谈及他从关门到开门的改变时,提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隐瞒我的父母,他们进不进来我也无所谓”(访谈编码:P1N9D02M)。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比较亲密,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尊重。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之间平时沟通顺畅,父母愿意在情感上支持子女,子女便愿意采取寻求支持等积极的方式与父母沟通^[39]。可见,如果亲子关系良好,亲子之间建立起了亲密、信任的关系,Z世代青少年就更倾向于相信父母,更愿意自我披露。

对于那些选择关门的Z世代青少年而言,他们主要考虑的不是保护隐私,而是更看重父母对他们的尊重。一位高二女生表示:“现在我爸妈进我的房间会问一下或者敲门,因为他们觉得我长大了,我也认为这样挺好的,说明他们尊重我”(访谈编码:P1N13D02F)。已有研究表明,亲子之间的隐私管理规则是随着子女的生命周期不断变化的,一些父母为了更好地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而与青春期的子女协商确定隐私边界,比如以子女希望的隐私边界谈论爱情和亲密关系等隐私话题^[40]。

无论选择开门或是关门,这些Z世代青少年和父母之间都不会因为房门的管理问题而发生冲突,这是因为“自主的孩子”的自我独立与自我披露已经达成了平衡与和谐。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自我披露意愿;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又尊重他们的自我独立性,两者处于一个合理区间,这是建构健康有序的家庭关系的关键^[41]。

“自主的孩子”通常处于这样的家庭之中,父母可以影响子女,但父母不会试图控制子女。与前两种家庭不同,这些父母不会严格管控孩子,使孩子相对处于一种更接近“放松”的状态。这可以从父母管理孩子学习的过程中窥见一斑。一位被访者表示:“从小到大,我父母很少干涉我的学习,主要是我自学。”(访谈编码:P2N1D01M)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以亲密和信任为主的亲子关系为Z世代青少年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自主的孩子可以设定自己的隐私界限,做出自己的决定。这些孩子在与父母的协商过程中保障了“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即他们具有选择与自己分享亲密空间、靠近自己的人、划定自己的隐私空间的权利^[42]。

自主决定隐私权并没有使这些孩子“不听话”,反而使得这些孩子更相信他们的父母。他们要么在父母面前完全自我披露,不关房门;要么以亲子之间相互尊重的方式协商如何关上房门、如何礼貌地敲门。虽然个体保有隐私的动机是使自身脱离某些社会关系,但是隐私的终极目的是更好地保护某种亲密关系,因为在形成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双重隐秘的形式或体验的特质,即双方尊重和保护一些秘密或隐私有利于维持和改善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43]。

综上所述,在亲密的家庭关系中,能够选择自主的隐私管理策略的Z世代青少年会受到自我价值的驱动,同时又得到了父母的尊重和保护,因而他们对家庭的隐私管理处于完全认同的状态,进而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自发的责任感,积极的自主意识也随之产生。他们对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更好的理解。他们也在与父母协商隐私边界的过程中学习权利与义务、决策与后果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Z世代青少年在家庭隐私管理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顺从的隐私管理策略表现为在家中基本不会关门,父母进入房间也不需要敲门,父母完全可以随时进入子女的房间,Z世代青少年接受父母对他们的亲密监管;妥协的隐私管理策略在行为上与顺从策略基本一致,但是Z世代青少年并不愿意这样做,只是在与父母的互动中败下阵来,不得不妥协;少数Z世代青少年可以采取自主的隐私管理策略,因为他们发现随着自己长大,慢慢有了隐私需求,他们的父母也尊重他们的隐私。

受访者在家庭空间中选择怎样的隐私管理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与父母形成的亲子关系。“控制—服从”的亲子关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Z世代青少年的家庭隐私和边界管理,也导致他们在服从父母的亲密监管的过程中渐渐丧失了自主发展的机会。“控制—抗争”的亲子关系让Z世代青少年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隐私和边界管理,他们表面上接受父母的各种亲密监管要求,不再坚持关门或敲门等显性隐私管理行为,但实际上他们采取频繁地更换手机密码、主动要求住校等隐性隐私管理策略表达对父母的不认同,并获得隐私主导权。以亲密和信任为主的亲子关系给了Z世代青少年足够的空间,亲子之间并不存在亲密监管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他们可以自主地开展家庭隐私管理。

所有被访Z世代青少年都表达了希望有机会与父母协商隐私界限的想法,但是在其家庭中却很少讨论隐私管理与亲密监管相关的话题。尽管我们期待Z世代青少年及其家庭对隐私保护有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但遗憾的是,专制的管教方式和以控制与服从为导向的育儿价值观念继续在Z世代青少年家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4]。大多数被访Z世代青少年要么在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情况下接受父母的亲密监管,要么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来反对父母以保护

和爱的名义实行的过度监督。

在“制造无形的门”和“消解有形的门”的过程中,亲子双方围绕隐私空间进行的互动与协商影响着Z世代青少年的自主发展。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通过隐私管理体验自我独立^[45]。本研究则发现,不同的家庭隐私管理策略对Z世代青少年的自我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顺从的子女视父母打破隐私边界的要求为合理的,这虽然避免了亲子冲突,却不利于他们自主性的建立。妥协的子女能动地、有技巧地避免亲子冲突的同时,创造了隐性家庭隐私管理模式并就此获得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是一种分离型自主,即强调青少年自主的核心是与父母分离,从而能够独立于家庭关系,实现自我依靠^[46]。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青少年面临追求分离型自主与重视亲密关系的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甚至可能对青少年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47]。自主的孩子在父母的信任与关爱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建立家庭隐私边界。他们既具有自我的隐私边界和管理能力,又愿意与父母沟通想法。这让青少年发展出“关系型自主”,即既具有独立个性化的特质,同时也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愿意依赖他人,接纳父母的意见^[48]。这种自主性的发展不仅不会引发亲子关系冲突,反而可以让Z世代青少年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父母亲密监管的要求,也更愿意接受父母的建议与支持,从而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

已有研究主要采取量化研究方法研究隐私沟通管理问题,依据截面数据呈现亲子之间隐私管理行为的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49],对隐私管理过程的动态性的关注较少。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初中生,高中生更多采取自主的隐私管理策略。这是因为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Z世代青少年的独立意识越来越明显,并会围绕敏感话题等隐私信息与父母持续地协商。亲子双方对家庭隐私管理的期待和家庭隐私规则,需要随着孩子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50]。但是,这种变化的前提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有协商的空间,这只有在尊重—信任的亲子关系之中才可能实现。亲子之间的隐私管理协商状况反过来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家庭关系及家庭支持等,并进一步影响家庭成员未来自我暴露隐私的意愿^[51]。本研究还发现,隐私管理还会进一步影响Z世代青少年的自主性发展。相对于顺从或妥协的隐私管理策略,自主的隐私管理策略对Z世代青少年的自主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Z世代青少年在进行隐私管理决策时,亲密、信任的亲子关系环境能为他们提供支持,促使他们在自我安全的情况下选择隐私边界,从而有利于在与父母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关系型自主。

本文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Z世代青少年的隐私观念、亲子关系与自主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家庭教育具有启示意义。一是亲子之间需要讨论和协商隐私管理策略的机会,父母要以适当的方式考虑Z世代青少年的想法,亲子之间尽可能要在隐私管理方面达成一致。二是父母需要根据孩子成长的生命周期,调整亲子相处模式和家庭隐私管理边界。随着子女进入青春期,他们期望自己有更多的独立空间,期待家庭隐私规则有所变化。伴随着子女的成长,父母要提前调整亲子沟通方式和家庭隐私管理边界,从而满足青少年独立性发展的需要。三是父母应尊重和保护子女的秘密和隐私,与子女建立亲密信任的亲子关系,理解和共情孩子隐私管理的需求,鼓励他们寻找合适的方法来管理自己的隐私。

[参 考 文 献]

- [1][31] Leaver, T. Born Digital? Presence, Privacy, and Intimate Surveillance, 2015, in Hartley, J., Qu, W. (Eds.), *Reorientation: Translingual Transcultural Transmedia*, Studies in Narrative, Language, Identity, and Knowledg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9 – 150, 154 – 158.
- [2] 贺刚 黄进:《儿童的绝对他异性及其教育蕴意——基于列维纳斯“他者哲学”视角》,载《教育学报》,2023年第4期。
- [3] Leaver, T. Intimate Surveillance: Normalizing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Mediation of Infants Online,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7, (2).
- [4] 王永雄:《中国“Z世代”青年群体观察》,载《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 [5] 谢洋 王曦影:《21世纪全球Z世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 [6] Smetana, J., Metzger, A., Gettman, D. C., et al. Disclosure and Secrecy in Adolescent – parent Relationships, *Child Development*, 2006, (1).
- [7] 陈应奎:《家庭隐私权》,载《家庭比较研究》,2000年第6期。
- [8] Howell, J. Parents, Watching: Introducing Surveillance into Modern American Paren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2010.
- [9] Abbas, R., Michael, K., Michael, M., et al. Emerging Forms of Covert Surveillance Using GPS – enabled Devices, *Journal of Cases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1, (2).
- [10] Ferron, M., Leonardi, C., Massa, P., et al. A Walk on the Child Side: Investigating Parents' and Children's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on Mobile Technology for Outdoor Child Independent Mobility, the 2019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2019, pp.1 – 12.
- [11][16][35][36] Petronio, S. Boundaries of Privacy: Dialectics of Disclosur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289, 20 – 32, 88 – 105, 156 – 789.
- [12] Caughlin, J. P., Petronio, S., Middleton, A. V.. When Families Manage Private Information, 2013, in Vangelisti, A.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321 – 337.
- [13] Petronio, S..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What Do We Know About Family Privacy Regulation?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0, (3).
- [14] 高伦 袁勤俭:《沟通隐私管理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展望》,载《现代情报》,2023年第5期。
- [15] Altman, I. Privacy Regulation: Culturally Universal or Culturally Specific?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7, (3).
- [17] Morr Serewicz, M. C., Dickson, F. C., Huynh Thi Anh Morrison, J., et al. Family Privacy Orientation, Relational Maintenance,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in Young Adults' Family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007, (2).
- [18] Laursen, B., Collins, W. A..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 Vangelisti A. L.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nd ed.),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pp. 333 – 348.
- [19] Williams, A.. Adolescents'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1).
- [20] Galvin, K. M., Braithwaite D. O.. Theory and Research from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Discourses that Constitute and Reflect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2014, (1).
- [21] 董小苹:《家庭隐私观代际差异比较研究》,载《青年研究》,2004年第6期。
- [22] 陆士桢 魏兆鹏 胡伟:《中国儿童政策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 [23] 田力力 王钟:《儿童秘密空间的现实遭遇及实现路径——基于文化视角》,载《少年儿童研究》,2022年第1期。
- [24] 胡洁人 易学欣:《〈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背景下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研究》,载《社会政策研究》,2023年第3期。
- [25] 朱秀凌:《控制与协商:手机对青少年“私人场域”的建构与入侵——基于中学生家庭的实证研究》,载《中国青年研

究》,2015年第1期。

[26] Fang, S., Gong, H.. What Happens after Young Adults' "Friending" of Par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about Mediated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Privacy Management in China, *Mobile Media & Communication*, 2020, (3).

[27] 曾秀芹 吴海溢 蒋 莉:《成人初显期人群的数字媒介家庭沟通与隐私管理:一个扎根理论研究》,载《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9期。

[28] 卡麦兹·凯西:《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边国英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29]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0-295页。

[30] Petronio, S.. Brief Status Report on 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013, (1).

[32] 黄安琪:《“权威与服从”语境中儿童秘密空间的现实遭遇与积极意义》,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3年第21期。

[33][40][50] Hernandez, R., Ebersole D.. Parents' and Children's Privacy Management about Sensitive Topics: A Dyadic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22, (1).

[34] Kennedy - Lightsey, C. D., Frisby, B. N.. Parental Privacy Invasion,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Perceived Ownership of Privat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Reports*, 2016, (2).

[37] Bojczyk, K. E., Lehan, T. J., McWey, L. M., et al.. Mothers' and Their Adult Daughters' Perceptions of Thei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1, (4).

[38] Xiao, Z., Li, X., Stanton, B.. Perceptions of Parent - 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within Families: It Is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011, (1).

[39] Gentzler, A. L., Contreras - Grau, J. M., Kerns, K. A., et al.. Parent - chil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hildren's Coping in Middle Childhood, *Social Development*, 2005, (4).

[41] 向志强 陈盼盼:《自我披露与边界管理:数字时代家庭传播隐私管理行为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42][43] 马克斯·范梅南 巴斯·莱维林:《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陈慧黠 曹赛先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80-84页。

[44] Talves, K., Kalmus, V.. Gendered Mediation of Children's Internet Use: A Keyhole for Looking into Changing Socialization Practices, *Cyberpsychology*, 2015, (1).

[45] Branje, S., Laursen, B., Collins, W. A.. Parent - child Communic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 Vangelisti, 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271 - 286.

[46] Van Petegem, S., Beyers, W., Vansteenkiste, M., et al..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and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Examining Autonomy Decisional Independence from a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2, (1).

[47] Markus, H. R., Kitayama, S.. Culture, Self, and the Reality of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3, (3).

[48] 邓衍鹤 宋 郁 刘翔平:《自我意志型的青少年自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49] 李飘飘:《社交媒体传播隐私管理的理论研究述评》,载《东南传播》,2019年第11期。

[51] Afifi, T., Steuber, K.. The Cycle of Concealment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0, (8).

(责任编辑:刘 彦)